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九五期 ——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3d)

【当事者说】	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王文耀·王保春
【史海钩沉】	文化革命殉葬品——关锋	丁凯文
【文革一页】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张玉钟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当事者说】

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 王文耀·王保春 •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一段时期江青因身体不好，毛泽东就送她去苏联治病。

◇ 陈伯达帮了江青的忙

20世纪50年代初期，江青曾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但是从未见她到任上过班。后来她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江青是个聪明且过于敏感的人。她是演员出身，对于艺术很内行。她也怀有个人野心，不断就中宣部的工作向毛泽东进谗言。20世纪60年代，她在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搞了一个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尽管他们曾几易其稿，但是毛泽东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去找陈伯达给改一改。陈伯达当时在上海正忙于工业调查，因有毛泽东的指示，只好为其修改，这才得以通过。

当时，周扬夫妇身体不好，刚在北京动完大手术不久，来上海休养。周、陈过去秀才交往，关系一直不错。陈伯达本想去看望周扬，但被江青知道后阻挡。江青说：“这里正准备批判周扬，而你去看他？不行，这让主席知道可不行。你不能去。”陈伯达无奈，只好派秘书王保春代表他去看望周扬以示关切。

◇ 江青与陈伯达争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小组的组长，江青为小组的副组长。江青为了权力，起初处处关心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江青曾向文革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大小事情，都要随时请示组长。”由于江青对陈伯达大献殷勤，陈伯达便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临时将权交给江青。这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群众，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还是江青说了算，她随心所欲，陈伯达得听她的。从此，陈、江意见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不断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陈伯达为了约束江青的权力，便找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办事机构，一切言行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擅自作主。会还未完，江青来了，她大发脾气：“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我还是不是第一副组长！”她看了报告的草稿后，立即加上自己的话，并且反复强调说：“我加上的这句是最最重要的！”

◇ 陈伯达抱怨：毛泽东痛斥江青的话没能向下传达

1967年二三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毛主席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么？！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毛泽东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绩的。”这时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然而散会后，没有一个人传达。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还哭闹着诉委屈：“正因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总是限制着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开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别人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说完直叹气。

我们听完陈伯达的话后，心想，陈伯达自己也挨了批评没有向下传达，还埋怨总理。看他情绪不好，我们只能安慰陈伯达说：“总理也很为难，因为江青和主席总还有夫妻关系这一层，而且批评她是希望她好嘛，也不是要打倒她。她不是说过，主席对没有希望的人，是不批评的。再说假如没有正式请示过主席就向下传达，主席万一不高兴，说这是我的家事，怎么你们也要管？那就不好收场了嘛！”陈伯达听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 陈伯达与江青厕所之争

1968年有一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转到了京西宾馆。陈伯达因平时喝水较多，

年纪大了又有尿频的毛病，常去厕所。京西宾馆会议室附近的厕所外边门上写着盥洗室，里边只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

一次，陈伯达刚上完厕所出来，正巧江青推门欲进。这时，江青见陈伯达从里边出来，便气愤地问陈伯达：“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吃惊地看了一下门上的标记说：“这哪里写着是你的厕所？！”说完便不满地走了。江青怒气冲冲朝着陈伯达大声地说：“今天你闯进我的厕所，明天你还要闯进我的卧室了！”

从此，这个厕所就再也没有人敢去了。

◇ 江青向陈伯达怒摔茶杯

1968年八九月的一天夜里，陈伯达从十一楼（江青住处，也是江青的代号）开会回来，直接回到自己的卧室。王文耀知道陈伯达回来了，便拿着精选好的文件卷宗送到他的床前（陈伯达习惯回来就上床看书）请他审阅。

陈伯达斜靠在床头，目视前方，脸色不是很好，看样子受了很大委屈而又无法对别人说。看到陈伯达痛苦的样子，王文耀吓了一跳。王文耀知道陈伯达的日子一直不怎么好过，便轻声问他怎么了。陈伯达小声地说：“没有什么，有点不舒服。”等了片刻，陈伯达看屋外无人进来便小声地对王文耀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刚才‘十一楼’（江青）给我发了很大的脾气，还摔了杯子。”说着便从被窝里拿出一个纸包给王文耀。

王文耀听后吃了一惊，当他双手接过纸包时，陈伯达小声说：“这个我拿出来时谁都不知道，只有‘十一楼’知道。也可能她还会要回去的，你看怎么处理一下？”王文耀说交给我吧。并问陈伯达：“她为什么向你发那么大的火，都有谁在场？”

陈伯达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有康老（康生）、姚文元他们。说是研究工作，可是一开始她就向我面前扔了一封信让我看，说我把写信的人逼到绝路上去了。康老在一旁说‘那不是信，那是绝命书呀！’”

王文耀问陈伯达这个写信的人是谁，陈伯达不肯说，只说：“他是人民日报社的一个编辑，是搞文艺工作的（后来才知道是李希凡）。‘十一楼’说我把他逼上绝路。你们知道，《人民日报》我就没有怎么管，怎么就说是我逼他呢？你不知道，她对我发了很大很大的脾气呀！”陈伯达说着形象地学着江青当时生气摔茶杯的情况：“嘭的一下，水洒了一地，杯子也碎了。我怕外边服务员听见了进来看见，就把地上的碎片捡了起来，用纸包上了。”陈伯达还说，过后他看江青似乎也有些后悔。

这些东西带回来以后，陈伯达又怕江青找他的麻烦，不知放到哪里才好，就交给王文耀处理，并且说扔掉，别扎着人。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江青的边是不能沾的。王文耀拿着这包碎瓷片也不知怎么办？不能丢，丢了江青要时拿不出来就坏了；可是不扔，她又会说你还留着干什么。王文耀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留着好。当天晚上，王文耀就把碎瓷片埋在了十五楼门前小河边的松树下。

过了不久，据说李希凡授意人民日报社一位青年，拼凑了一张江青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忽然就着这张照片说：“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李希凡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陈伯达插了一句：“你说我要逼死他，谁还敢给你

说。”江青大声说：“你造谣……我瞧不起你！”陈伯达也顶了一句：“我也瞧不起你！”这时，周总理对江青说：“你是说过的呀。”江青又和周总理对顶起来。陈伯达生气地走出会场，在走廊里转了一圈，又准备进会场，刚走到门口，周总理出来见到陈伯达说：“你还回来干什么？！”陈伯达理解周总理的意思，便转身出门，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 江青说：陈伯达比毛泽东谱还大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陈伯达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当时社会上较乱，组织上出于安全着想，为他配备了一辆苏制保险吉斯车和一辆国产红旗车（这些车都属中办车队管），当然他原来坐的那辆灰色吉姆车还在。另外我们工作人员有时因工作出去办事，就临时从红旗杂志社司机班暂借一辆米色的伏尔加小车用一下。陈伯达为了出去调查方便，也坐过几次伏尔加。他去工厂、学校、郊区农村时喜欢坐这辆车，不招摇显眼，较为随便，但就一样不称心，车身小，上下车特别费劲。

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地说：“哼，你比主席谱还大，主席才1辆车，1个厨师。你可好，用4辆车，4个厨师呀！”陈伯达当时就愣了，说：“我，我哪儿有那么多车和厨师，我怎么不知道！”他散会回来后，很不高兴地问我们，他是不是有那么多的车和厨师。我们当时听了也很吃惊。后来仔细一想，情况也不完全对。陈伯达原来坐的是1辆吉姆车，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两辆车，1辆保险吉斯和1辆红旗车。保险吉斯车他只坐过一两次就不坐了，嫌太大，太显眼，让人退回去了。红旗车起初也说太大不愿意坐，后来换了1辆小红旗，开会时常坐。厨师，陈伯达原来住中南海迎春堂时，是不要厨师的，吃饭是工作人员到甲区的西楼特灶食堂打饭吃。1967年，因刘叔晏（陈伯达的夫人）怀疑有人爬她家的墙，让公安部的人进去查脚印，被江青知道了，被“赶出”中南海。搬到新建胡同以后，组织上给陈伯达配备了1名厨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陈伯达自己就住在了钓鱼台十五号楼。同时住在十五楼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关锋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按照钓鱼台原来接待外宾的习惯规定，住在哪个楼，吃饭也就在哪个楼里。陈伯达住的楼里有3名厨师，特级厨师宋师傅给陈伯达做饭，另外两位给文革小组成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做饭。这是当时按接待外宾的做法，还未改变。江青可能将这3名厨师和陈伯达新建胡同家中的那位厨师算在一起，陈伯达就有4名厨师。

陈伯达对此极为在意，提出不要厨师，说原来就没有厨师，要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饭，或者打饭回来吃。后来钓鱼台改为各楼就给首长一人做饭，工作人员都集中到十七楼去吃饭，十五楼就留下宋师傅给陈伯达做饭。陈伯达心里不痛快，起初他只是说饭菜不好吃，味道像饭馆的菜饭，说是说还吃些。其实他并非对宋师傅本人有意见。宋师傅看到陈伯达常剩下饭菜，知道他对饭菜有意见，便当面征求陈伯达的意见，以便改进自己的工作。陈伯达对宋师傅说，你做饭的技术很好，很辛苦，表扬了一番。同时又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吃不惯这样好的饭菜，喜欢吃普通的饭菜。宋师傅也向我们工作人员征求意见，很诚恳地想改进工作，其结果还是一样，做好的饭菜，陈伯达只吃很少一点，大部分剩下。

1969年12月林彪发出一号战备令时，陈伯达被遣散住在京西的玉泉山。陈伯达平时吃饭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宋师傅每次做好香喷喷的饭菜送上去，鱼、虾原封不动端下来，倒了浪费，别人吃了也不好，只好中午的菜晚上热一下再送上去。但陈伯达还是未动，照旧端下来。我们每次都劝，陈伯达就一句话：饭馆子味，不想吃。急得这位钓鱼台名厨宋师傅都要哭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常此下去怕影响陈伯达的健康，这可是大事。可能宋师傅也向钓鱼台的领导汇报过，觉得自己工作不好。其实，陈伯达的目的就是不想要厨师，和江青斗气。

米粮库胡同的房子装修好后，战备解除了，陈伯达搬进了新房，他吃饭还是如此，并提出请宋师傅回钓鱼台。我们说，宋师傅走了你吃饭怎么办？陈伯达说：“你们随便给我做点吃的就行了。你们忙不过来时，就让李玉元（管理员）做就可以。”我们也不好为难宋师傅，就请他回钓鱼台了。

李玉元是农村来的，做城里人吃的饭菜水平差了点，我们俩也就常抽空去做饭。三个人中就王保春还会做几个像样的菜，但偶尔为之还可以，长此以往可不行，其间闹过几次笑话。我们做的饭菜也比较单调，也就是鸡丝面之类的。陈伯达是福建人，爱吃鱼，我们就做红烧鱼什么的。一次，李玉元去供应站采购了一只宰好的鸡，拿回来洗洗就放锅里煮，熟了以后，老李准备把它切成丝，做鸡丝面。这时王保春去厨房看看，发现老李切的鸡肉丝怎么有黑色杂物。一看未切完的整块鸡肉上，有个像橘子样大小的黑糊糊的东西，再仔细看发现，老李煮的鸡没有取出鸡嗓子，将鸡嗓子里鸡吃的杂物当肉切了。幸好发现得早，没有把它做到饭里。还有一次，李玉元给陈伯达学做了一条红烧鱼。陈伯达开完会回来正饿，听说老李做的是红烧鱼很高兴。李玉元非常高兴地将自己得意之作送了上去。这时王保春有事去向陈伯达汇报，一进门，只见陈伯达和平时一样，边看书边吃饭，吃得正香。陈伯达用筷子不停地在那条红烧鱼身上捅来捅去，鱼皮都剥得吃光了，可是鱼肉和鱼骨、鱼刺怎么也分不开，鱼肉还露出红色。王保春在一旁看出了问题，便对陈伯达说：“您别吃了，那鱼好像不熟，再去烧一下吧。”陈伯达看不清楚，还固执地说：“嗯，没关系。”王保春赶快将鱼端到厨房，又回锅烧了一遍送上去，陈伯达才算吃完了这顿饭。

在这段时间里，陈伯达因为感冒，中央开会他请假没有去。周总理很关心他，同时也知道他让宋师傅回钓鱼台去了，没有厨师做饭，便给陈伯达打电话，批评他说：“你让厨师回钓鱼台是不对的，怎么能让秘书们你做饭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嘛！你这样把身体搞坏了，让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周总理同时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工作，还是要找个厨师来给伯达同志做饭，要注意他的身体才是呀！”当时陈伯达正患感冒，周总理介绍了他自己对付感冒的办法。他对陈伯达说：我有时在感冒初期，喝一杯茅台酒就好了，挺灵的，不妨你也试试看，少喝一点。”陈伯达告诉我们，他也想试试总理这个办法。我们就为他买了一瓶茅台酒，他只喝了一小杯的少半杯，就受不了了，发起烧来。其实他和总理不一样，总理平时参加宴会多，还可以喝一点酒。而陈伯达平时一点酒不沾，所以他说：“总理好意向我介绍他的经验，可到我这儿怎么就不灵了呢。”

陈伯达以后一直没有要厨师，一直到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都是李玉元为他兼管做饭。

◇ 江青对陈伯达说：我要摘掉你的领章帽徽

大约是196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社报送了一份有关日本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阅后有一个较长的批示。

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文艺演出，节目没有完，陈伯达便叫王文耀，告诉他办公室值班的缪俊胜，通知人民日报社尽快把这个文件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这件事小缪当时就办了。

节目演完之后，陈伯达说是去一楼大厅参加一个在京的宣传口的会。陈伯达事先不知道，出席中央碰头会的人大都出席了，会议由江青主持。会议一开始，江青便说：“让陈伯达作检讨，他管的《红旗》杂志，半年不出版。他还封锁最高指示。”陈伯达听了一愣，说：“我没有封锁主席最高指示呀！”江青说：“还说没有，主席最近有关日本问题的指示，你问问别人都知道吗？”康生在一旁拉着长声说：“我反正没有看到。”陈伯达说：“我看了以后，当时就传送出去了……”

陈伯达还没有说完，江青就把话筒从陈伯达面前抢了过去，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我来揭发。你还穿着军装，带着军帽。”陈伯达说：“大家都穿军装，也不是我一个人穿军装。”江青紧接着说：“我要摘你的领章帽徽！你知道红五星的来历吗？”陈伯达看到江青这种架势，知道会议是要批自己，便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使劲往桌面上一甩，大声说：“大字报上街！”意思是说，可以贴大字报打倒我。叶群接着举手喊口号似的说：“拥护江青同志！”场内无人响应，气氛十分紧张。这时江青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马上对到会的人员宣布：“在场的人不许出会场，今天的会议不许传出去，作为一条纪律，谁传出去，拿谁是问。不许记录，记了的必须放下笔记再走。”说完，江青继续说“红五星的来历”。

散会以后，陈伯达回到家里，心情不好，情绪极为低落。第二天，他到红旗杂志社，在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上说了不少丧气话。他说：“……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也有不少错误，可以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杂志半年不出版不怪你们，责任都在我，我没有抓紧，由我承担这个责任。你们也可以给我写大字报，大字报上街都可以……”大家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说笑话。

离开会场之后，我们对陈伯达说：“你不该向大家说这些话，搞得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有气无力地说：“唉，昨天的会议，他们一定有人去参加了，会回去说的，不可能不说，他们会知道的。没有关系，随他们的便吧……”

两天以后，我们将那次会议的录音带从中央办公厅借来，王保春、王文耀、缪俊胜三人重新听了一遍。我们对江青的这种无理霸道行为很是不平。这盘录音带我们没有马上还回去，而是存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

1970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天才论”受到批判后，这盘录音带让我们紧张起来。当时觉得将带子退回办公厅，怕江青知道，会引火烧身；不退放在办公室，也是条罪状；将它洗掉也不忍心。犹豫很久，我们最后将它放在办公室不易发现的地方。

◇ 江青与中央碰头会对抗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央领导人员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锐减，陈伯达与江青的矛盾不断，而江青不断向毛泽东告陈伯达的“黑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工作能顺利进行，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中央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研究重大决策。从此，陈伯达积极参加这个碰头会议，而不主动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但是，江青并不满意周总理召开的碰头会议，她多次催促陈伯达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与周总理的碰头会议相对抗。陈伯达总以各种借口推脱，拒绝召开文革小组会议。江青对此非常生气，但陈伯达是组长，他不参加江青就不好单独召开小组会议。江青很狡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她事先和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好了，借江青每天晚上请文革小组成员看电影的机会来开会。有一天晚上，陈伯达正在卧室床上躺着看书，钓鱼台值班室来电话说，江青请陈伯达去十七楼看电影。陈伯达一听马上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睡觉了。”我们照此转告了值班室。过了没有两分钟，江青又让值班室来电话，说：“康老、江青同志都在等伯达同志。”陈伯达听后急了，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哼！什么看电影，她是又要开小组会，强迫我表态，我不去。你们就说我安眠药已经发作，起不来了。”说着他把被子往上一拉，不说话了。

◇ 江青批判新启蒙运动

1968年，陈伯达实在不愿意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想离江青他们远一点儿。可是新建胡同的家已经被他的妻子刘淑宴闹得不像样子了（刘淑宴正和陈伯达闹离婚），街坊四邻都知道那是陈伯达的家。中办管理局给陈伯达另安的新家——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因房子破旧正在修缮。陈伯达又不想住钓鱼台，管理局无奈就临时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丙区，国务院这边一个大殿北边，一个很深的四合院。这里前后几个院子很长，但几个院子无人居住和办公，非常安静。在那人心慌慌的年代，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陈伯达很满意，再三对我们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十一楼”（江青）他们知道了。我们当时觉得很好笑，对陈伯达说：“‘十一楼’要找你，去问警卫局你住在哪儿，他们敢不告诉她？”

当时江青、姚文元等正在挖空心思找陈伯达的茬。他们写了一篇批判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对江青说他不看，让她找陈伯达看去。一天，江青真的来儿找陈伯达谈这件事。江青一进院子见到陈伯达便说：“哎呀，这个地方可真不错，赶明儿我也来这住。”江青把准备好的批判文章交给陈伯达。江青走后，陈伯达既生气，又着急。因为1936年至1937年间，中国文化界掀起的新启蒙运动，陈伯达是主要发起人，这不是直接对着他来的吗？

陈伯达很气愤地对我们说：“他们这是冲我来的，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就是30年代我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中提出的‘反对异族奴役、反对复古、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敌和民主的觉醒’，是反日反蒋的，这有什么错？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提‘反对日本侵略’，禁止报刊上出现‘抗日’这个词，所以只能用‘反对异族奴役’的提法来代替，我这里的‘异族’就是指日本嘛。新启蒙运动的建议提出以后，上海的《读书生活》、《新世纪》，北平的《现实月刊》、《时代文化》、《北平新报》、《华北呼声》等等好多报刊都发表文章响应，抗日民主思潮得到蓬勃发展。当时的亲日派郑孝胥、守旧派杨立奎等对此很恐慌，通电宣称要‘铲除’新启蒙运动。但是进步思潮总是阻挡不住的。”他很生气地讲了一阵。

于是陈伯达就翻阅书籍，找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肯定新启蒙运动方面的一些言论，让王文耀都抄录下来，经他仔细看后，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他们都表示不同意批判新启蒙运动，这才把那篇批判文章堵了回去，没有让它出笼。

但是，陈伯达并没有忘记江青说要来这个地方住的那句话。为了躲避江青，陈伯达急得不知往哪儿钻。他对我们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她还会来的。”他将这件事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暂时到养蜂夹道干部俱乐部的游泳池边上去住，说是林彪在那儿刚住过，较为安静。

就这样，陈伯达在中南海丙区的大四合院里住了没两天，又匆匆忙忙地搬到中南海外边的养蜂夹道去了。

◇ 陈伯达撕碎了与江青的合影照

中共九大以后，陈伯达住在米粮库胡同，可是他在钓鱼台十五楼的办公室还留着，由缪俊胜留守。陈伯达好久没有去了，想去看看。一天，他去钓鱼台，正巧碰上江青在大院里拿着照相器材，许多身边工作人员陪着，兴致正浓地拍摄风景、人物。见陈伯达来了，江青也为陈伯达拍了好几张，同时还让别人为她和陈伯达拍了几张合影照。之后，陈伯达回到自己的十五楼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但总觉得有些不安，便离开了钓鱼台。

对于与江青拍合影照之事，陈伯达老放心不下，犹豫许久，最后将与江青照相的事告诉了叶群。叶群听后，对陈伯达说：“这可不好，这让主席知道了可不好，江青是什么目的？！”陈

伯达听叶群这么一说，心里更加不安。江青洗照片都是在新华社，陈伯达马上让自己身边的缪俊胜坐车去新华社摄影部。照片正好洗完，江青还未取走，缪俊胜向摄影部的人打过招呼就取走了陈伯达的照片。

缪俊胜将照片交到陈伯达手中，陈伯达当场就将照片撕成碎片。缪俊胜当时吃惊地说：“唉呀！你怎么给撕了！新华社知道是我取走的，江青同志向我要，我可怎么交代呀！”陈伯达说：“没关系，你就说给我了。”从表情上看，陈伯达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

后来，听说江青严厉训斥了新华社，而且提出无她的指示，以后任何人不许拿她的东西。

◇ 陈伯达家来了“不速之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定了文章的篇数，并排印有清样稿，“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断。大约1968年底，陈伯达因无事可做，便决定重新再编。于是他找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几个人，编起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印出清样以后，报送给毛泽东审阅。过了几天，陈伯达给汪东兴打了个电话，讲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目前出版的必要性等情况，并且问汪东兴毛泽东看了没有，汪东兴告诉陈伯达，毛泽东一夜未睡看完了。陈伯达听了非常高兴。

大约是1969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个大型群众活动。晚上看过焰火之后，在城楼上休息当中，陈伯达和毛泽东谈话讲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问题时说，里边有几篇文章对当前情况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应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说，你先选几篇送我看看。

晚会散了之后，人们都下了城楼，剩下陈伯达、姚文元 and 新华社国内部的记者在城楼的西侧厅审改当天的新闻稿。定稿之后已经很晚了，在下城楼时，陈伯达和姚文元并肩走着。陈伯达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将他和毛泽东在城楼上的谈话告诉了姚文元。

第二天下午，陈伯达正考虑给毛泽东呈送哪几篇文章时，来了位“不速之客”——江青。江青是第一次来陈伯达这个家，她下车后边进陈伯达家的门，嘴里边嚷着：“哎呀！老夫子在哪儿呀！”进来后，她对陈伯达说，她是刚从毛泽东那儿来的，毛泽东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大家来分头搞吧，文章由你来分配。寒暄了一阵，江青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放下就走了。

江青走后，陈伯达很丧气，他很不愿意江青插手。陈伯达估计在城楼上告诉姚文元之后，当天晚上姚文元便将这一信息告诉了江青，而江青马上就到毛泽东那去抢了这个差事。

不管怎么样，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总是件好事，陈伯达也有事可做了。在碰头会上，有人说可以以《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工作。陈伯达反对说：“毛主席自己写的东西，每一篇都经过他本人审改过，不能叫编辑委员会，我们只作了些具体的出版工作，要说只能是一个出版委员会。”会上按文章内容分了几部分，陈伯达一部分，周总理一部分，康生一部分。我们记得总理那部分是有关经济建设和财政方面的文章。

陈伯达这边的人来自中央政治研究室，康生那边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当时说康生那边人手不够，要从政研室调过几个去。在未调去之前，陈伯达给政研室的同志开了个会。会上在研究如何进行工作时，大家认为，为了全书文章体例的衔接，调到康生那边去的人，应该经常回来说说情况。但又觉得这样不大好，怕会引起康生等人误解。怎么沟通，想不出办法来。在

大家作难时，王保春建议，调过去的同志，可中途回研究室过党组织生活，这样可以顺便谈一下情况，不就解决了嘛。陈伯达对这一建议非常赞同，大家也都认为这样好。后来，在陈伯达倒台后，中央专案组审查王保春时，多次逼他交代：“你王保春的点子多得很，陈伯达都很赏识你。”

不管陈伯达如何努力，但在江青的多方干扰、破坏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没有完成，最后还是被康生总揽过去了。

◇ 江青对陈伯达落井下石

在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已被批判。会议将要结束前，陈伯达去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很平和地对陈伯达说：“你看你把个会议搞成这个样子，下一步怎么办？”陈伯达说：“我下农村去。”毛泽东说：“你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好好谈一谈……”陈伯达离开毛泽东住地去找江青。江青一见陈伯达便说：“啊！稀客稀客……”江青自己不和陈伯达谈，而是驱车带陈伯达一起去找康生。

到康生那里时，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坐在康生的会客厅里等着，这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

陈伯达坐下还没说上两句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同时开火，对陈伯达连讽刺带挖苦。陈伯达被羞辱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大文人受到如此待遇，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几乎当场晕倒。他们让陈伯达准备下次在大会上向大家检讨。陈伯达说：“我现在脑子很乱，无法动笔写。”康生说：“你无法动笔，我代你写。”康生代替陈伯达写的检讨，用词相当刻薄，陈伯达都难以起齿。没有办法，为了过关，只好忍辱在会上照本宣科。

下山回京之后，陈伯达本想回家当农民，过个平民的晚年。他没有想到被关进监狱度过了18年，期满1年后就去世了。

□ 《百年潮》 2008年12期

~~~~~

#### 【史海钩沉】

#### 文化革命殉葬品——关锋

• 丁凯文 •

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人之多，如过江之鲫，大多数被打倒之人都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以及“反动学术权威”等，但是积极参与文革被毛泽东重用的人竟然也有一些因为表现过分积极而被打倒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就是其中之一。文革过去已有30年，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探讨一下关锋的经历，更加有助于人们对文革的反思。

#### 一、关锋早年经历：14岁的共产党员

关锋原名周玉峰，1919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西北部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童年时代的关锋在自己的家乡读过两年的私塾，念过《四书》《五经》等书。1927年北伐革命兴起，庆云县也开始有了洋学堂，关锋由此有机会考进了县里的“最高学府”——庆云中学。那时的庆云中学还未有高中部，关锋仅仅读到初中就毕业了。

1933年年仅14岁的关锋就在庆云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9岁的关锋担任了山东省乐陵县委书记。1939年正式改名关锋。1944年担任山东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同年关锋被调到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任教育科长。1947年关锋出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1949年关锋还担任过地区性报纸《黎明报》的社长。

1950年关锋出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又调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中央党校在山东成立了第四中级党校，关锋出任副校长。

这一时期的关锋基本上没有离开学校和教育，关锋虽然没进过正式的大学，但是由于关锋用心和努力，学习上无师自通。用关锋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候，当社长的要自己动手写稿、改稿，当校长的要亲自备课、上课，形势迫着自己读书，那时，我就是自学，幸亏，还有些四书的底子。尔后，读书、写书、写书、读书……，我的历史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 二、左派新秀：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这是改变关锋人生经历的关键一步。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共中央设立的集研究、谘询、参谋于一体的机构，既是党中央的智囊团，又是重要的写作班子。当时在此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论造诣较深又有政治工作经验的重要人物，如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等人。关锋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一段时间后，任哲学组组长，后来政治研究室成立思想界动态组，关锋任组长。当时关锋主要的工作是编辑中央政治研究室刊物《思想界动态》，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小的刊物，专供毛泽东等中共高层人士阅读。通过编辑这份刊物，关锋对理论界的思想动态十分了解。

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关锋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写手自然也参与其中。1957年8月26日关锋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一文，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政党的必然性。关锋积极参加这场反右斗争，初步显示出了关锋左派新秀的作用，成为毛泽东反右运动的吹鼓手。

1958年6月，中共中央创办理论刊物《红旗》杂志，陈伯达将关锋调进编辑部。1958年底，关锋正式调任《红旗》杂志编委。他所负责的《思想界动态》杂志交给别人负责了。在《红旗》杂志社，胡绳、邓力群还为关锋专门组建了一个由他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关锋除了参加《红旗》编委会会议，为《红旗》写文章外，基本上不参加具体的编务事宜，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关锋在编辑《思想界动态》之余还常写一些杂文、杂谈一类的文章，关锋对还对中国哲学史颇感兴趣，1958年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关锋在此文中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警句里即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关锋的观点在当时也是很普遍的，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国人民、各行各业，概无例外。但是将中国古老哲学里的老庄、孔孟学说的研究也纳入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范围，关锋的确是一鸣惊人。毛泽东看到此文颇为欣赏，从此开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

## 三、卷入文革：走向“辉煌”

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关锋可能也就是党刊的一位普通编辑，至多也就是个左派中的笔杆子而已。可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从此将关锋卷进风口浪尖，身不由己地走向“辉煌”和“覆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吹响了毛泽东的文革进军号。身为北京左派理论阵营的关锋对此文的来历和背景却一无所知，因此当《文汇报》驻京记者找关锋谈一谈“读后感”时，关锋也仅仅是将姚文看成学术问题谈了自己的观感，记者当然大失所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姚文的背景和上海与北京两个阵营之间较劲的内幕逐渐清晰之后，关锋才恍然大悟，迅速加入了江青、姚文元的阵营表态支持。1966年的第1期的《哲学研究》发表了关锋和吴传启的《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关锋指责吴晗“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而“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是他的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日报》1966年3月19日予以转载。1966年第5期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和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关锋在文章中指责吴晗“积极向无产阶级、向党、向人民进行阶级斗争……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意识、有目的的。”196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关锋的这些大批判文章毫无事实地给历史学家吴晗上纲上线，积极配合了毛泽东与江青在上海向北京中央发起的进攻。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中央的几位理论家、笔杆子们谈话，其中有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等人，关锋也身列其中，可见毛泽东对关锋这位“左派新秀”的重视。毛泽东的谈话虽然谈的是6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注释问题，但是最最要害的却是关于刚刚发动的文革运动的看法。毛泽东说了一番画龙点睛的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番话杀机伺伏，表面上针对的是批判彭德怀，但矛头所向却是北京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

事后关锋负责将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文，毛泽东的这段话关锋当然照录不误。当关锋将整理出来的纪要交给田家英时，田家英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话删去。纪要印出来后，江青对此极为不满，据说是关锋向江青汇报了此事，这也成为田家英日后被迫害致死的原因之一。关锋是否是此事的告密者其实并不重要，即使关锋当时不向江青汇报，江青也一样查得出是谁“篡改了毛主席指示”，身为纪要起草人的关锋当然要向组织上如实汇报纪要的起草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早已下定决心发动他蓄谋已久的文革运动，毛泽东需要一个突破口，打击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就可顺藤摸瓜揪出他的“后台老板”——彭真和刘少奇。

#### 四、跻身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泽东

1966年4月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该组组长，陈伯达则提名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为组员，这个小组成为日后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基本班底。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组员则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和姚文元。这个小组直接隶属于毛泽东，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关锋此时跻身文革小组，俨然就是中央首长了。

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首先仰赖于毛泽东的垂青。60年代的中国虽然政治形

势已经很左，但是能够积极配合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者却还不多，很多人不知道文革的来头，更不知文革目的何在，不少人心存观望，即使出面批判几句“反动路线”也未必能批到点子上去，所以毛泽东急需几位理论写手为其文革大业吹喇叭抬轿子，关锋身为《红旗》杂志的编委，本是毛泽东“秀才班子”写作组的成员，此时也就顺理成章跻身文革小组。而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关锋能够迅速领会上级领导的意图，及时拿出上司所需要的大块头理论文章，巧妙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起到对运动推波助澜之功效。除了上文所述的关锋大作外，1966年5月8日，关锋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北京市委，认为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北京日报》在4月16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此文也大大配合了毛泽东对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的批判。

1966年9月下旬，毛泽东对当时的文革形势有了新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毛泽东决定通过批判刘少奇所代表的“错误路线”将运动推向深入。此时毛泽东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名词，作为打倒刘少奇的新武器。陈伯达和张春桥为林彪起草了国庆讲话，正式将其提出。随后，王力和关锋在《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了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社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打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论还恶狠狠地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要阴谋篡党，篡军，篡政。他们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把复辟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他们身上。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主要是通过他们进行的，或者是在他们包庇下进行的。所以，只有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粉碎剥削阶级的复辟阴谋，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由此，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73岁生日，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中南海聚会。毛泽东在这次会餐是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要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毛泽东显然对此是深思熟虑的，要进一步推进文革，就要全面夺权，将掌握在刘邓手中的权力全面夺过来，也就是说，不仅最高层要夺权，各地市的领导权也要夺，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重要的战略部署。事后王力、关锋几位“秀才”仔细琢磨了毛泽东的意图，由王力、关锋等起草了1967年元旦社论，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章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展开全国全面夺权的意图，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此外，关锋还根据毛泽东肯定上海一月夺权的讲话精神，起草了1967年第2期《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明确传达了毛泽东“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最新指示。关锋还起草了1967年第3期的《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夺权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毛泽东给予了此文很高的评价，批示曰“很好”，还特地在“很好”两字下打上了着重点。王力和关锋还起草了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的修养》的文章，题目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在1967年5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此文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通知，号召全党组织学习和讨论。显然，关锋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交代部署的写作工作，并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与此同时，关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北京和全国大批进京红卫兵、各地学生、军

队院校学生、革命群众、各地造反派组织，发表了大量的讲话。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到1968年8月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关锋就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发表讲话50余次，如1966年7月27日关锋在北京广播学院发表讲话，8月1日关锋在中央文革接待室对学生发表广播讲话，9月23日关锋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10月12日关锋对北航工人赤卫队和地院红卫兵发表讲话，11月18日关锋戚本禹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进行了谈话，12月14日关锋对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发表了讲话，1967年1月10日关锋戚本禹对军队总参三部工作人员发表了讲话等等，这里无法一一列举。总的来看，关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不仅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迅速化为《红旗》杂志社论传遍全国，而且积极投身文革热潮，宣讲文革的意义，指导文革运动的开展。

现在大陆出版的关于文革的书刊文章大都丑化关锋，似乎关锋原本就是一个心怀鬼胎的坏人，唯恐天下不乱，故意制造各种动乱。这种观点显然非常片面。首先，关锋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文革路线，那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全国开展全面夺权斗争等并非关锋个人的发明，关锋固然有其左的一面，但是不能将他在文革当中的责任无限夸大到离开基本事实的程度；其次，关锋并非文革当中的决策人，他仅仅是个跟班的，所有重大的决策都来自于毛泽东、江青等人，再通过陈伯达等传达到关锋，关锋执笔将这些指示或谈话精神转化为文字，通过《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向全国公布。平心而论，关锋等人其实就是如后来“梁效”般的毛泽东御用文人而已。

## 五、是否担任过解放军总政副主任

文革期间关锋是否出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大陆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一些退休高干在回忆录和某些书刊就曾提及关锋曾被林彪任命为总政副主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林彪授命关锋专管《解放军报》，也就是后来牵扯上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关锋到底有无担任过此一军内要职？

2002年应友人的恳请，坚拒谈论文革的关锋自己给了如下的说法：“66年12月27日我骤然发高烧，住进301医院，67年1月10日稍后病愈出院。在此期间发生了事先没有预计（当然也没有毛主席的指示）的两件大事：一是张春桥在上海夺权；一是打倒了陶铸、打倒了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副主任好几位，刘是身强力壮做实际工作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出了医院之后就有人给我传达：林彪向毛主席提议要关锋作总政副主任，毛主席同意，并说‘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这个说法实在令我吃惊！）我听后感为震惊，我坚决认定我不能做这个工作：（一）我在军队工作时间很短，只作过连指导员，毫无军队工作经验，且当时已知部队高干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军事院校的红卫兵最为难缠；（二）所谓三军（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反总政主任萧华之风甚为激烈，风暴之前兆已经出现，加上毛主席说什么‘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我去了总政，如何与萧相处，我绝对不能卷入反萧或保萧浪潮中去。1938年夏萧华带挺进纵队到达我们冀鲁边，那时他是司令兼政委，确是文武全才，我做乐陵县委书记时同萧有所接触（挺进司令部驻乐陵），对之印象甚好。……经过慎重考虑，我写了报告给毛主席，坚决不干，理由当然只能是以我的经验、能力做不了这个工作。大概是考虑了我的意见，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萧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副组长很多，我是副组长之一，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际工作担当，但实际上毛主席要我把《解放军报》管起来，这是实打实的担子，担子实在不轻。可我不能再推辞了——也得知毛、林并没有放弃要我当总政副主任的想法，还拟经过一个过渡，要我去做总政副主任——当然这也没有对我明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后来‘三军’掀起反萧浪潮，大概‘三军’看到我不实际支持他们，所以说我偏袒萧华、保萧华了。7月份，萧华倒了，我也倒了。”

显然，关锋自己的回忆更有说服力。关锋从未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去《解放军报》也是负责重大新闻、版面、社论等，这也是毛泽东的主意，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的主力大将关锋在军报发挥更大的作用。另据笔者所知，江青等人的确非常希望文革小组的人能打进军队内部掌握一部分实权，如果关锋这一步成功了，他们还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事实上毛泽东当时还曾考虑过让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但当林彪意识到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意图时，就坚决封杀了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的途径，也就有了后来迅速任命资历不高的李德生为总政主任一事，从而也阻挡了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林彪倒台后，张春桥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总政主任，此乃后话矣。

## 六、毛泽东转向，左派小爬虫倒台

言及关锋的倒台，就要追溯到所谓“揪军内一小撮”问题。现在大陆官方的流行说法是“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同年7月末，《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鼓噪：‘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于是，一些造反派就到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闹得乌烟瘴气。”是林彪、关锋、王力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搞乱军队搞乱全国而提出来的说法。事实真是如此吗？

1967年7月20日发生了武汉“720”事件，这个事件被毛泽东看成是“反革命事件”，随后全国报刊上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愤怒讨伐，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认定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和“黑后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据王力在自己的反思录里回忆说，7月22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720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毛泽东不仅同意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甚至对整体形势作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75%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文革运动要解决问题之一是“武装左派”。8月4日毛泽东在上海单独写信给江青，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并说“如此左派声势大振，右派气焰就押下去了”。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有关“720”事件的宣传方针，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都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8月1日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多篇社论，不断加强“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事实证明，关锋等人不过就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并宣传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那篇8月1日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不过就是诸多评论文章之一罢了，宣传口径正是毛泽东先前定下调子。

“720事件”后外交部造反派利用王力8月7日的谈话在外交部大肆夺权，揪斗陈毅，利令智昏地搞出了一起外交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引发了一场国际争端。这时的毛泽东也发现如果继续“揪军内一小撮”，势必引发更大的内乱。8月12日，毛泽东下令停止“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8月26日毛泽东决定转向，命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带话给北京的周恩来，“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随后改变主意：“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作的一项重大决策。杨成武回京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当晚的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向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传达了毛泽东的“圣旨”。8月30日陈伯达主持《红旗》杂志编辑部会议，由戚本禹宣读了毛指示的文件，关锋与王力同时被勒令“请假检讨”，关锋由此开始了他的被关押生涯。

关锋与文革期间其他老干部的倒台有很大的区别。那些倒台的老干部通常的罪名是“走资派”、“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文化大革命”。而关锋却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坚决支持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积极宣传和响应毛泽东思想的人，关锋每做的一件事都是在组织领导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来办的，没有一件事是关锋自做主张、自行其是，关锋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江青等人，甚至关锋都不敢与林彪有何瓜葛，关锋纯粹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自己人，如此革命的左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红人怎么也会倒台呢？显然，这要从毛泽东的文革全局来予以分析。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并非有一套现成的剧本，只要大家按部就班跟着唱即可。很多事态的发展也会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毛有时也有失算、失控之时，“720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文革运动发展到此时，虽然全国夺权一事颇有斩获，但也激起很多反弹，尤其是军队内部的反弹，搞得不好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为了稳定军心，毛泽东不得不考虑适当地转向，给文革运动泼点冷水降降温，踩一下刹车。那么最便捷有效的办法就是抛出几个替罪羊，将他们逮捕，清除“他们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样对于文革大局更为有利，再说抛出几个小人物对中央文革小组也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关锋的不幸恰恰就在于他正好是毛泽东需要抛出来的小人物，毛泽东既可杀一杀造反派的嚣张气焰，也可就此稳定了局面，一举两得。

## 七、身陷囹圄14年

文革初期的关锋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积极参加毛泽东的文革运动而换来14年的牢狱生活。1967年8月底关锋被宣布“请假检讨”，实际上就是被隔离审查。关锋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的二号楼，吃住等生活条件都还相当不错，每天都可看报纸，还可收听收音机，只是没有了人身自由。在这段时间内，关锋的唯一任务就是写“检讨”，不必干任何体力劳动，还有专人为其打扫卫生，有医生定期检查身体。1967年10月陈伯达代表中央与关锋谈了一次话，除了继续检讨和加深认识外，陈伯达还告知关锋将要转去北京卫戍区。关锋与王力随后被送到北京西山，分别软禁在两所别墅里。这一时期关锋的生活待遇依然没变，还可带一些书籍在那里阅读。然而在1968年1月26日关锋被送进中共关押政治犯的专门监狱——秦城监狱。显然，关锋的问题被升格成为敌我矛盾。不久，关锋被开除出党，1982年1月关锋才被释放出狱。关锋为了毛泽东的文革大业竟然付出了整整14年的壮年生涯，出狱时的关锋已然63岁。关锋日后并未透露他在秦城的监狱生涯，但据王力的自述，王力本人遭受了狱中非人的待遇，以此度彼，狱中的关锋也好不到哪去。关锋也未透露在关押期间是否对他有过提审。其实关锋与王力的案情大致相似，既然毛泽东吩咐手下不许提审王力，那么关锋有什么好提审的呢？关锋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1982年邓小平的中央对关锋问题重新审理，将其释放，考虑到文革的特殊情况，对关锋免于起诉，维持了开除党籍决定不变。

## 八、晚年生活，焕发学术青春

邓力群曾对与关锋同时被打倒的王力建议说：“杜绝人间往来，闭门读书，甘于寂寞，但是要研究一点问题”。估计，这也是中共中央对关锋的要求。出狱后的关锋对文革往事采取“四不主义”，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邓力群在回忆录中还把王力和关锋加以对比，最后指出“关锋后来确实是闭门读书、写作，成绩不小。”从1984年起关锋重新拿起笔来著书立说。1990年，关锋以古棣之名与夫人周英合作出了两部书，一部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和法学发生学》，30万字；一部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学》，40万字。与周英合作的140万字的《老子通》上、下册，199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3年之后，以古棣为主编，戚文（即戚本禹——笔者注）为副主编的135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辞典》，由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关锋尚未发表的文稿还有与周英合作有90万字的《孙

子会通》；与戚文合作有《论语十日谈》、《论语今译和解说》姐妹篇，共约75万字；与周英还合作有140万字的《通假字典》，以上已定稿的，合计已是300万字。还有未完稿的有《庆云斋丛稿》——关于校勘、训诂和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等方面的稿子，日集月累，现约有80万字。关锋打算数年之后告一段落，并在此基础上再写几本专著，书名拟为《校勘学新论》、《训诂学新论》、《汉语语法学新论》、《音韵学新论》，等等。另外还有其他计划，如60万字的《论哲学》，10余万字的《中国上古史大纲》，后者首章已在山东《哲学战线》上发表。约15万字的《赫拉克利特新探》，这是关锋唯一一部关于外国哲学家的专著，已完成过半，另《上古天文历法新探》正待杀青。60年代出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将会有新订稿。1991年版的《老子通》亦将会作出新的修订。

关锋的晚年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再次焕发了学术青春，取得了极为可贵的成就。的确，关锋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本色还是一个学者，关锋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参与了一项错误的运动。如果不是文革，关锋也许还有更出色的学术贡献，作出更大的成绩。我们不能不为关锋感到惋惜。2005年6月7日晚关锋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 九、给人们什么启示

细审关锋的一生，关锋基本上就是一介知识份子，从其早年出任学校校长、教书，到后来担任杂志社编辑，关锋都是一个文人，一生靠写文章济世。即使文革期间关锋的行情最盛之时，关锋也不过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里的一个笔杆子而已，所做的工作就是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写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只是这种工作乃御用文人之职，真正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是很难与官宦为伍的。文革中的关锋有幸身为“中央首长”，但却什么实际权力都没有，仅仅是毛泽东、江青的传声筒而已。在为这个政权效了犬马之劳后却被自己的主子无情地一脚踢出，不仅没有落下一点好，反而还进了自己人的监狱，受到非人的折磨迫害，在狱中虚度了14个春秋，出狱后依然要背上“坏人”的名声，为自己从前的主子背上历史的黑锅。呜呼，这个世上还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事情吗？关锋出狱后不得不选择了沉默，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笔者相信，关锋虽然闭口不谈文革，但他一定相信历史会对他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的。关锋的晚年重新找回了自我，在学术的王国中任意驰骋，他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才是关锋的追求，也是他原本的乐趣所在。

（本文发表时小标题有改动，删去了注释——《北京之春》编辑部）

□ 《北京之春》 2009年2月号

~~~~~

【文革一页】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 张玉钟 •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当年，我才23岁，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比较幸运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李庆霖，是莆田地区内第一个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也是因此事第一个接触李庆霖的人，因此我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后来我读了许多关于此事的报道

文章，其中不少与事实有出入，现在此事早已成为历史，我想把许多还鲜为人知的情况及细节，归纳为几点解密于此以飨世人。

一、李庆霖的信是如何到毛主席手上的？

1973年4月29日，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第四天，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突然来到莆田地委，点名要我陪他去办一件事（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共9个人中只有我一个莆田人，他每次来莆田采访多数由我陪同）。这一次他非常神秘，他是上午到达的，下午要我带他去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我问他什么事？他一再对我交代要保密，然后告诉我，这个学校有个教师叫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仅给他回信，还给他寄了300元钱；毛主席回信的内容他记录在笔记本上念给我听：“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还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的，要先派记者来调查，连福建省委领导都还不知道呢。

下林小学离城关只有两公里左右，下午我带赖玉章坐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这个学校。我们点名要见李庆霖，当时他还在上课，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下课后李庆霖见到两个陌生人找他，神情很是惊异。待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后，赖玉章开口问他：“你有没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在一旁没有说话，一直注意观察他的表情，我记得他沉默好久都没答话，他在心里估摸到底是福还是祸。赖玉章问话后微微笑着，他心中觉得应该是好事降临，于是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赖玉章说：毛主席看到你的信还亲笔给你回了，并给你寄了300元钱。他听了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而是紧张而严肃地反问：“毛主席是怎么回的？”赖玉章给他念了信的内容，这时我看到他脸上渐渐舒展开来，溢出兴奋之情。赖玉章说这件事还要十分保密，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兴化宾馆某房间，约定晚上到宾馆细谈。晚上7时多，李庆霖到了赖玉章宾馆房间，就我们三个人谈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夜深才离去，这次谈话（事实上是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

李庆霖那天晚上已经没有了白天那种拘谨严肃的神情，表现得非常高兴，他说话慢，语调也比较低，但完全打开了话匣子，从他家历史身世、儿子上山下乡遭遇的苦难，到自己如何想给毛主席写信，都说得非常详细。我们提出了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问他信是如何寄出去的？原来那一天他在一张竹桌上写好了信，接着就写信封“毛泽东主席收”，就拿出去邮寄。当时莆田城内只有一家邮局，离他家西北向。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打鼓，倒不是怕闯祸，主要是担心主席收不到，因为这之前他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他想可能是周总理没收到，那主席要看到这封信就更难了。走到半路，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经常看到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场，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请她转交给毛主席。他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动，就马上折回家中，就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因为我年纪轻古文基础差，我马上问他，王海蓉是女的，怎么称“先生”？他温和地笑了笑说：“先生”是一种尊称，男女都可以用（对女士也可称先生我就是这一次听李庆霖说的）。他还说他也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然后就把给毛主席的信套进去寄走。因此可以断定，这封信是王海蓉收到后看了一定很感动，亲手转交到毛主席手上的，非此这封信也就夭折了。我想全国知青和家长真的应该感谢王海蓉先生！

我看到的所有文章包括有的采用李庆霖自述的，都说新华社记者赖玉章是5月1日到莆田找李庆霖的，这是记忆上错误，准确的是4月29日。过了几天到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了福建省委，省委通知了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部队干部叫刘功，激动地对着电话筒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许多媒体都写到这个细节，这是确实的。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回信的复印件，随后也收到了300元钱。从此开始，这件事就在莆田城内传开来了，李庆霖出名了。

二、李庆霖是怎样性格的一个人？

李庆霖1929年出身在莆田县城关一个极度贫困的贫民家里。他祖父当过乞丐，父亲很小就被送到一家首饰铺当学徒，以打制妇女首饰为业，但因生意萧条，铺子关门也到乡下乞讨，后来患上精神疾病，上吊自杀未遂致残，年纪不大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人就靠母亲打小工、当保姆维持生计。尽管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母亲却咬着牙节衣缩食硬撑着供李庆霖读书，而李庆霖的妹妹上不起学，8岁就被送到一家草编店里学编织草帽草席。1944年福建省立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免收学费还供应伙食，李庆霖便去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那一天，母亲挑着行李陪着儿子，从很早上路，一直走到下午才到学校。李庆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发愤刻苦，熬了4年到1948年毕业，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月薪为140斤大米，生活很清苦，但总算有一口饭吃。解放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任教。1951年，22岁的他与学校所在地的农村姑娘张秀珍结婚，婚后5年中长子良模、女儿良培、次子良雄相继出生。1956年全家搬回城关老家居住。1958年他被调到沿海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并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才3个多月就初考，这个班因成绩太差没有一个考上初中。当年正逢大跃进时代，时兴“插红旗、拔白旗”，莆田县教育局召开小学庆功大会，李庆霖等一批升学率低的班主任被宣布作为“白旗”拔掉，同时他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每月50.5元降为42.5元。这一次处分在他心里刻下了一道永远抹不掉的伤痕，直到他出名后在各种场合都愤愤不平不厌其烦地谈起。

一辈子艰难曲折的经历，使他学会了坚强。看起来文弱书生，心里却潜藏着一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强者精神。正因为这样，他遭遇上山下乡中的困难，敢于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敢于给周总理写信，没有收到回信也没灰心，反而进一步想到给领袖毛主席直接写信。也许是他从小刻苦读书积累下的扎实基础，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他出名后，红旗杂志通过地委宣传部约他写一篇谈反潮流的文章，这个任务部里就交给我去转达，过几天他把稿件交给我邮寄到北京，我把稿件从头到尾看了，不久红旗杂志刊登出来，我又认真看了，几乎全部是原文，编辑基本没有改动，这当时就让我这个拿笔杆为生的心悅诚服。现在我回忆这件事，并非说他所包含的政治内容，而是说他文字功底和朴实文风，有一种很大的可能让毛主席也被他所感染。当年把毛主席复信和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向全国传达，印发出来的是他原原本本的信，一个字没有改动，原文中就没有一个错别字，我想就是现在任何一个大秘书要做到自己一次性起草的文章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而不需要改动一字的，恐怕是极少的。毛主席自己一生讲究文字，看到这样一封信怎不会被感动？而且全信朴实无华，让人读了觉得真实可信，却也不乏幽默感，比如“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这些话很符合毛主席喜欢的语言风格。还有从全信内容看，李庆霖虽然把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写得很尖锐，但敞开的是一种真诚的心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否定毛主席亲自倡导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甚至你读不出信中有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怨恨情绪，这也不能不令伟大领袖感动！所以，毛主席在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中，赞扬李庆霖那信“写得相当好啊”。他看了三天才下决心回信。他还建议把这封信编入学生课本中。

三、李庆霖政治上是怎样大红大紫起来的？

毫无疑问，李庆霖“告御状”促使了中共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和全面调整知青政策，直接使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包括回家乡的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大好事。随着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李庆霖成了全国知青及其家长心中的神圣人物。因为他为广大知青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料，李庆霖出名之后很快就在政治上也大红大紫起来，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主席对他器重有加。毛主席除了给他亲笔回信并寄钱外，还特地对他政

治上的发展也嘱为安排。回信后的两个月，约在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县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传来的一个内部消息：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人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主席对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的政治安排说得如此细致而具体，这令各级领导感到极大震动和高度重视。但据我所知，当时领导层内部都在紧张商讨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却没有一个领导正面向李庆霖透露。因此他本人对此毫无所知。当年身兼福建省党、政、军一把手的韩先楚接到毛主席的这一内部指示后，即把李庆霖召到福州亲自接见，但也并没有当面说出毛主席的指示，只是鼓励李庆霖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李庆霖就向韩先楚司令员提出两件事，一件就是上面说的1958年他被插上白旗受处分，他要求给予平反纠正；还有一件是他妻子曾经是国家正式职工，困难时期被辞退，要求给她恢复一份正式工作。这两件事韩先楚都认为合理很快就解决了，李庆霖被调到莆田全县最好的一所小学即东方红小学（现为实验小学）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还补发了从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资，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学当正式职工。

这是李庆霖出名后短短数月内实现的两项要求，李庆霖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对于入党要求他心里却没有想到，因此一直没有提出来。最早带来毛主席回信消息的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那一段经常来莆田追踪采访，他对李庆霖还没有提出入党要求心里很焦急，他对我说：小张，毛主席很希望李庆霖参加十大，眼看十大就要召开了，但李庆霖还不知道提这个要求，官员们可能不好当面问李庆霖这件事，你小青年干脆给他明确提一提，没关系的。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应允了赖玉章，一个人到了仓后路居仁巷15号李庆霖家，因为已经多次接触很熟悉了，我就开门见山问他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他说省地县领导已经解决了他的两件事了，孩子在农村的困难，全国都在解决，相信也会好转的，他说他很满意了。我看到谈话还不能进入有关入党的主题，就索性问他，听说毛主席有对汪东兴说了一段你的事，你知道了吗？他说没有人告诉他。我就把具体内容说了，他听了非常惊讶兴奋，问我怎么办？我说入党要求必须本人有这愿望并自己提出来，别人不好代替，你要赶紧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他还问我一些如何申请的具体事项。第二天他就向莆田县委写了入党申请书。我看到许多文章都说李是在7月1日写的申请书，但据我回忆，写申请的时间应在7月中旬。莆田县委接到李的申请后，马上报告了地委和省委，接着各级领导及组织部门内部开始为李的入党紧张运作，进行内查外调，但最终没有在党的“十大”召开前解决李的入党问题，当然李就失去了参加“十大”可能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拖延解决李庆霖入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调查中发现敌伪三青团档案中有一份李在仙游师范读书时全班同学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的名字前面打勾，有的没打勾，分辨哪一种是三青团员费了一些时间，到确定李不是三青团员而决定发展他人党，时间就拖到“十大”之后。翌年即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反对当局的这一派就把这件事当做当局打击迫害李庆霖的一大罪状，认为是当局怕李庆霖去参加“十大”受到毛主席接见说出对当局不利的话而故意设置障碍。李庆霖本人也有这种看法，这是他后来直接跳出来反对当局领导的起因之一，并多次为自己最终未能见到毛主席表示遗憾。

李庆霖第一次在全省公开“大出风头”是1973年7月2日，省委在福州市召开群众大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1号文件、学习毛主席回信和李庆霖信件。这之前省委领导也已接到毛主席对汪东兴关于李庆霖政治安排的谈话内容，因此省委高规格邀请李庆霖来福州出席大会并讲话。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李庆霖口才不一般，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约一个半小时，开头从学习毛主席回信的重大意义，说到他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信，后半部分他话锋一转说：“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给我写信的事在社会公开之后，我们莆田社会上产生了一股不能小看的政治压力，企图对我倒咬一口，把此事全盘推翻。我想有必要说它一下，让我们共同来提高对路线斗争的认识，也许有一点好处。”接着他讲了几个具体反对他的事，却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高度上来，这意味着李庆霖开始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了。但这一次他只讲到反对他的有关工作人员，矛

头还没有指向当局领导层。

随后，在李庆霖入党问题上虽然拖延了一段时间，但在仕途上却接连步步高升，在担任东方红小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后，又被任命为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副局长）、莆田地区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虽然错过了参加“十大”机会，各级领导还是不敢违背毛主席的政治安排，推选他出席了四届人大，并当选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如今天是正部级的待遇），还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至此，李庆霖的政治生命走到了顶峰，真可谓大红大紫。

四、李庆霖最终成为悲剧人物的原因何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庆霖很快受到关押批斗，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虽然获得减刑，但也被关押到1994年3月才提前出狱，回家后贫病交加到2004年2月凄惨去世，最终成为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物。客观公正地分析，应该说造成他悲剧绝不是他个人原因，主要是“文革”的时代悲剧促成了他个人悲剧。

李庆霖被卷入政治漩涡关键的时间点是1974年初开始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地区当时派性斗争非常激烈，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李庆霖1973年出名后那一段，虽已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但还没有参预到两派斗争中，经常说到的只是反对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一些人和事，更多谈到的是社会上和党内的不正之风，他最恨的是“走后门”，他当省高招办副主任期间就不顾情面顶住了一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上大学的事，而且还带头把自己的次子李良雄又送去上山下乡，这在当时干部群众中都是认可并传为美谈的。

但在李庆霖有了一系列的官位头衔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影响力之后，“四人帮”就在他身上看到可以利用的优势，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就把他“包装上市”，《红旗》杂志约他写了谈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帮”随即把他与辽宁省交白卷的张铁生相提并论，树为“北张南李”全国两个“反潮流”的典型，制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后来有人说，江青曾接见过他，这我没听他说过无法证实，但他亲口给我说过，他到上海时马天水、徐景贤接见了并大肆鼓励他“反潮流”。李庆霖也就在这种舆论的吹捧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并与日俱增。

接触过李庆霖的人都会觉得，他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全身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书生气。他刚出名后第一次出差，还不懂得如何办报销手续，特地到我们办公室问，走时告别不是和别人握手，而是两手抱拳连连作揖。他走后大家都笑着议论，真是书生一个。像这样一个一生只在小学教师岗位上的小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具备政治家的素质、眼光、见识和城府？但“文革”那种畸形的时代，却借着毛主席回信的东风，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高端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赋予了他极大的政治发言权，他再也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之舵，只能随着变幻莫测的险风浊浪起伏升沉。据我所知，1973年他抨击政治的矛头还只是局限于当地机关一些反对过他和事，而对各级当局领导安排他那么多官衔还怀着感激之情，但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莆田地区乃至福建省的派性斗争就打着拥护“反潮流”的旗号缠住了他，把矛头对准了当局领导，首先就把李的入党时间拖延不能参加“十大”当做当局领导的大阴谋进行追查，进而把当地机关中反对他的一些人和事都当成是当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策划，并上纲上线到这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李庆霖本人在这种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被推到第一线，和当局领导严重对立起来从而一发不可收。

1975年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后气势更红火了，派性势力对他的吹捧、利用也进一步无以复加，而他本人头脑也更加发热膨胀起来，更深地卷入派性斗争，把自己凌驾到当局领导之上，以“太上皇”自居的味道越来越浓。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了李的所作所为，

姚文元就派记者来福建调查。调查的结论却是：“李庆霖同志保持反潮流战士的革命精神，对于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别人不敢说他敢顶”，“他同当地领导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这种结论当然使李庆霖更加有恃无恐。福建省委领导出于爱护向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反映他的问题。邓小平批评说：“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省委领导也找他谈话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很难起作用的。

到了19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更是从莆田当地发展到成为福建全省的一个“派头”了，到处演说作报告，表态支持造反派，把各级当局领导当做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可悲的是，在他的心里，他完全把这当成拥护和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样才对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他自然成了“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黑帮、亲信、爪牙而受到重重的惩处。10月底被宣布停职检查，随即被隔离审查了1年多，在莆田当地并被押到福州等各地，一天两场三场批斗，前后共有百多场批斗会，也时常有过拳打脚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何曾有过这种境遇，他曾有多少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过了1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送到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场关押改造。对此判决，李庆霖始终心存不服。他承认自己在运动中说错话办错事，但说他是打砸抢分子及带头人他绝不承认。当时福建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著名纪录片《铁证如山》，据说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招待华国锋等中央政治局领导看了都感到震动。其中有个镜头：莆田县委大院里有间挂满枪支的房子里，李庆霖被带到这里，镁光灯闪过就被带出来，而解说词说：“李庆霖组织武斗队，大搞打砸抢，专业武斗队有201个，参加人数有6700人。”李庆霖只要有场合说话，就说那是强安在他头上的。后来即1990年南平地区中级法院给予减刑到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3月他出狱后虽获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却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状，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扰。

一人落难、全家遭殃，其妻张秀珍也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改造”3年，后来虽然给予平反，但一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没恢复公职。李庆霖给毛主席信中反映遭受困难的长子李良模，李庆霖有权有势时并没有趁机安排他回城工作，而是继续让他留在原地荻芦公社水办大队，后来在那里入党，并在荻芦公社担任一个挂名的党委委员，李庆霖被关押后他也很快被免去职务，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个人仍留下来劳动，1982年好不容易招工到仙游糖厂当厂区铁路的养路工，以后当上小火车司机，现在在一个镇的土地所工作。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复信后，李庆霖带头又把他送去上山下乡，后来作为身边没有子女政策安排回城到县公安局工作，这时也被开除出县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队的知青点，但是知青办不要，街道也不收，他只好把户口揣在口袋里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才安排到他母亲原来工作的莆田四中当一名职工。

在李庆霖遭难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让李庆霖精神感到欣慰的是，全国两千万知青及家长大多没有忘记他，在李庆霖坐牢和出狱后，不少老知青想方设法找到他或打电话给他，有话语安慰的，也有寄钱送物的，这是他独有的一笔精神财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3年8月12日。我大学一个同学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念博士，她博士论文竟是写李庆霖，而且该大学居然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专门批准她回来当面采访李庆霖。她所在大学里有两个美国教授，妻子都是当年中国的知青，听说她要回国见李庆霖，都委托她向李问好，我听了也很受感动。因此很乐意那天陪她来见李庆霖。李还是居住在那低矮的旧屋子里，房间里的一切老旧得几乎原封不动，唯有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的镜框锃亮崭新。李庆霖只能躺在床上，

气管炎很严重了，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仍然非常友善接待我们，有问必答，说话慢慢的却很真诚。问他当前生活如何着落，他说：出狱后分文没收入，逼得实在没办法，他找到莆田县领导，郑海雄书记批给他每月210元；后来接任的书记刘可清批准增加到每月300元；现在又增加到每月500元，据说是习近平（当时任福建省长）批的。他说出这些领导的姓名一个一个记得很清楚，听得出他还是怀着感恩心情的。他最后几句话我记得很牢，他说：我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没错，我也没错。后来发生的事是一场历史的梦，现在梦醒了，我也快归天了。半年之后李庆霖去世了。我责怪他儿子没有通知我，没能赶过去送丧，但电话中他告诉我，当时出不起钱火化他爸爸，还是城厢区区长阮军批准给予免费火化。还有他没钱买墓地，1993年他奶奶去世、1997年他妈妈去世，连同他爸爸去世3个人的骨灰盒一直放在自家狭窄的屋子里而得不到安宁，后来也是阮军区长批准他以三折优惠购买了一小块公墓地，把3个人连同他早年去世的爷爷的骨灰一起合葬，终于使他们入土为安了。我想，李庆霖的名字还是会被历史记住的，也应该记住的，连美国人都感兴趣，中国人更应该给予记载总结并吸取教训，本着这个目的，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如实写下来。也许对历史研究有一点点价值吧。

写于2008年11月9日

□ 《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